

既有异于图谱，亦无关于修炼，其分隶均属未安，今从《文献通考》列小说类中，庶得其实”；对于《海内十洲记》则说“诸家著录，或入地理，循名责实，未见其然，今与山海经同退置小说家焉”<sup>①</sup>。在目录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的时代，这些关于异域的想象资源，在官方权威的目录中从史部的地理类“退置（子部）小说家”，说明在观念世界中，它也开始从“地理”变为“小说”，从想象中的“真实”变成“百不一真”、“恍惚之事”，这时，人们开始接受“考索”、“责实”的结果。也就是说，从利玛窦时代到乾隆时代，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古代中国对于异域（同样也是对于自我）的知识，已经从“想象的天下”进入“实际的万国”。

<sup>①</sup> 《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1）卷一四二，第1206页。

### 第三章 作为思想史的古舆图

用“地图”作为思想史的证据，研究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问题，现在在汉语学术界，包括海峡两边，都开始流行。这种取径的出现，应该说和外国新理论新观念的传进来有关系，尤其是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影响有关。福柯是一个很有想象力和洞察力的人，也是一个很有颠覆性的思想史理论家，他在一个本来很单纯很学术的，属于“地理学”的问题上，也推广了他关于“话语”和“权力”的理论，用他的话说，一切话语背后都有权力，而话语本身也会成为权力，所以，在“领土”、“地平线”、“等高线”等等本来属于地理学的术语里面，他看出了背后有“权力”（power）关系。他把它放在政治、法律和文化领域进行推敲，例如说“领土无疑是地理学的概念，但是它首先是一个法律—政治概念：某一权力所控制的地域”，这一分析相当有洞察力，领土确实就是政治的控制范围，而地图上以国界所划分的“领土”，确实标志了一种并非仅仅属于地理学的政治学范围。这方面的论述，是1976年在法国一家地理学杂志 *Herodote* 对福柯的采访里面表达出来的，后来发表成了一篇专访稿，就叫做《地理学问题》<sup>②</sup>。

<sup>②</sup> 《权力的地理学》，中译本见《权力的眼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确实,地理空间划分与描述是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结果,但是,地理空间反过来又是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标志,然而在很长时间里面,并没有太多的人真的用地图去讨论中国思想史问题,因为地图过去一直属于地理学、测绘学的领域。过去也有很多关于地图的研究著作,像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的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第二章《地图史》,司马富(Richard J.Smith)的 *Chinese Map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地图绘制学史》第二卷第二册《传统东亚东南亚社会中的绘图学》<sup>①</sup>。此外,日本有织田武雄《地图的历史》、海野一隆《地图的文化史》,都有有关的内容<sup>②</sup>。最近几年,古地图领域也出版了不少资料,比如,曹婉如等编的三大册《中国古代地图集》,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编的《舆图要录》,菲利普·艾伦(Phillip Allen)的《古地图集精选》,还有最近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编的《地图中国》等等<sup>③</sup>,研究起来就很方便了。

①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第二章《地图史》;司马富(Richard J.Smith): *Chinese Map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kong, 2000; 又,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2, Book.2: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Edited by J.B.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② 织田武雄《地图的历史——世界篇》(东京:讲谈社,1974,1994)。海野一隆《地图的文化史》(中译本,香港:中华书局,2002)。顺便可以提到,前些年,文学家董启章一本以香港地图来讨论观念和思想的著作影响很大,在香港地图里面,充满了殖民与后殖民、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当然,地图只是他的“话题的引子”,所以,后来他的书列在“联合文学”里面。

③ 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998),分战国至元、明代、清代三卷;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编《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6827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菲利普·艾伦(Phillip Allen)编《古地图集精选——透视地图艺术与世界观的发展》(薛诗绮等中译本,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01);周敏民编《地图中国》(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2003)。

但是,这些资料是不说话的,更不直接表达思想与观念。有些话,地图背后的思想与观念,是要研究者自己“看”出来的。因此这里要讨论的就是,怎样才能从地图中看出思想史,或者说,古舆图如何作为思想史的资料?

### 一 边缘与中央:欧洲古代世界地图中的东方想象

首先,我想从欧洲绘制的古地图的边缘和空白处,来看一下其中流露的有关东方的想象、意识和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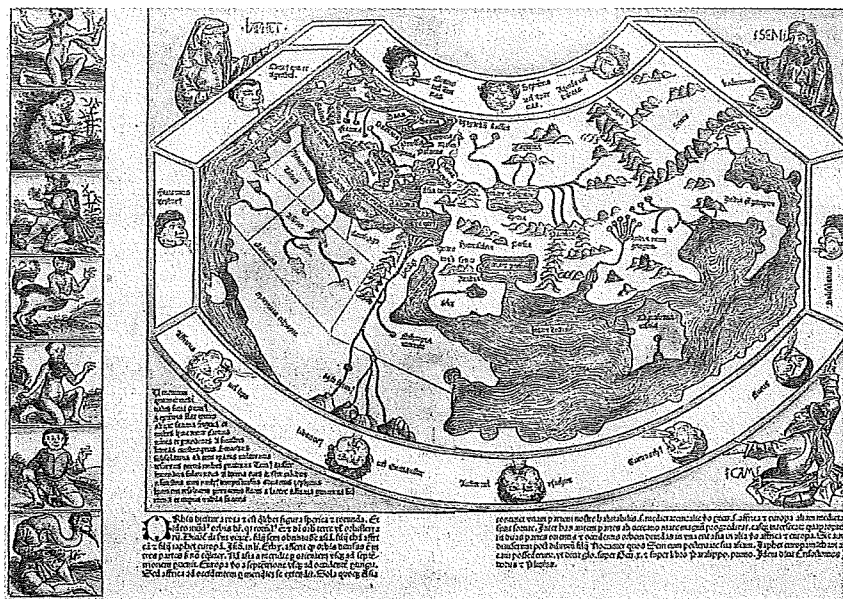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地图多是纸本或绢本,像马王堆帛书《地形图》;当然也有石刻的,像苏州的《平江图》,在形式上往往和古代中国绘画差不多,有的地图干脆就是美术作品,如名山胜迹图、城市地图等等。一般来说,很少有设边框,再加上中国的地理特点,地图很少有大海,所以很少有空白,没有空白就不能有太多的点缀,特别是古代中国地图常常有大幅的文字标识,更没有空间留下来绘制奇异类<sup>①</sup>。而现代的各种地图,又常常受到现代西方制图法的影响,在周围的边框上用黑白两色标志经纬比例,这是“科学”和“标准”的做法,而大片的海面上也不再有什么想象,而只有更多的岛屿和航道,所以,大多也没有边框的装饰和点缀。但是,在古代欧洲出版的各种地图上,尤其是世界地图上,好像有一个习惯,在周围常常点缀图

① 即使东南部留有海洋的空间,古代中国的地图也常常把本来分散在更大区域的各种岛屿和陆地其他国度挤在这一空间里。

这些安插在地图四周的装饰性图像、绘制在空白处的物怪，却在有意无意之中，可能会和地图中间的内容发生关系，透露或暗示一些观念。

像，而在地图空白处，尤其是大洋中又要画上各种见闻和奇物。他们常常画一些东西在地图的边缘和空白上。可是，这些安插在地图四周的装饰性图像、绘制在空白处的物怪，却有意无意之中，可能会和地图中间的内容发生关系，透露或暗示一些观念<sup>①</sup>。

在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里，收藏了很多欧洲出版的古地图，其中有一幅Hartmann Schedel (1440—1514)画的早期古世界地图，在这幅图的边缘，我们可以看到，有十二个鼓着嘴吹风的头像，这大概是象征着十二个月的不同风力，不同的风力影响着天下气候的变化<sup>②</sup>。这是很常见的，欧洲古地图经常画上这种形象，表示着地理空间和天上气候之间，有某种关联。像托勒密《宇宙志》1482年版和《地理学》1511年版所附的地图也一样有这种形象，在那个吹着风的头像下面，还画上了云彩<sup>③</sup>。另外，像利玛窦 (Matteo Ricci) 的世界地图，也继承了奥代理 (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 的世界地图的传统，同样在南极空白处画上了世界各地的八种动物如大象、犀牛、鸵鸟、狮子、有翼怪兽、鳄鱼，在大海处画上了九艘帆船和十五种喷水巨鱼、蛇形大鱼。直到南怀仁绘制《坤舆全图》，仍然继承这种博物的传统，画了这些图像，而且比利玛窦更多出了长颈鹿、吐绶鸡等等，这些图像，大概一



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藏早期欧洲所绘世界地图

① 其实，这不正是地图，也不止是欧洲，像古代中国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的四周，就画上了十二个神像，大概和十二个月之类的意思有关，因为楚帛书内容讲的就是这十二个月的事情，图文之间总有些关联，这就好像古代中国绘画上有题画诗、上下款识、印章，以及装裱留出的题跋空间一样。

② 图见周敏民编《地图中国》，第31页。

③ 图见菲利普·艾伦 (Phillip Allen) 编《古地图集精选——透视地图艺术与世界观的发展》，第16~1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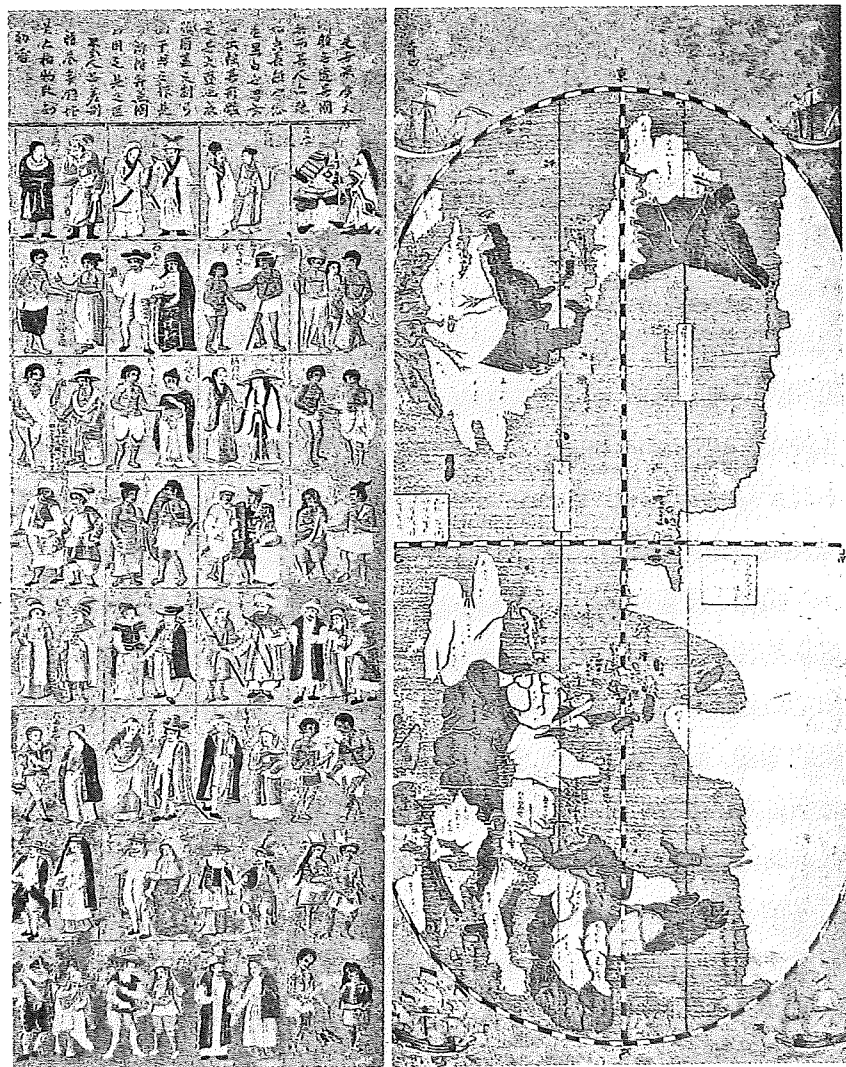
方面象征着对大海的跨越和对世界的认知，一方面象征着对大海中种种物怪的想象和畏惧。

并不是只有欧洲有这种习惯。其实，古代中国也有这种对未知领域的想象，也有把这些想象绘制成图的传统，例如《左传》宣公三年有一个关于九鼎的著名传说，九鼎是什么？就是夏代把各种奇怪的事物形象铸在鼎上，让民众知道，据说人们如果知道了物怪的形象以后，就不会遇到这些怪物，就是遇到了，也能避开，因为物怪被人识破。这就叫“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sup>①</sup>，这就是古代传说中九鼎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原因。这种“博物”的传统，一方面支持了孔子关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教育方法，后来张华的《博物志》一类书就是继承这个知识主义传统，另一方面支持着巫覡技术的神奇想象，这就是后来从《山海经》到《白泽精怪图》的巫术观念<sup>②</sup>。

我想，15、16世纪以来欧洲人的世界地图上的图像，大约也是同样的意思，我在欧洲的一些博物馆参观，开始觉得他们的植物图、人体图、地图真有些装饰繁琐，可是渐渐发觉，装饰不仅仅是装饰，还有一些很微妙的象征意味。西方地图传到东方以后，这种制图的传统也影响到中国，也影响到日本。比如，日本根据利玛窦《山海舆地全图》

<sup>①</sup> 杜预的解释是，第一，这是关于四方奇异物产的知识，“图画山川奇异之物而献之”；第二，这是一种趋吉避害的知识，“图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备之”。《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第1868页。

<sup>②</sup> 关于这一方面的话题过于复杂，需要专文讨论。



神户市立博物馆藏1645年日本绘《万国总图人物图》  
（选自中央公论社《日本の近世》1）

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上,就有种种关于航海的知识。又比如,收藏在神户市立博物馆的正保年间(1644—1647)刊刻的《万国总图》的四周,就画上了大明船、日本船,而贞享五年(1688)的《万国总界图》又同样在上两角处画上了大清船、日本船。另外,同样收藏在神户市立博物馆的《四都市图》与《世界地图》屏风,则完全是欧洲的方式,在左右两侧画上了当时所知的各地民族的形象。到了宝永五年(1708),稻垣光朗绘制《世界万国地球图》,则不仅在两半球的中间空白处画上了唐船和阿兰陀船的样式,而且还在上方辟出空间,专门绘制了表现世界各种人形象的十六幅图,把两方面的传统汇在了一起,表示着航海技术对于环游地球的信心,也表现了这一边儿的人对于另一边儿的世界与人类的知识,逐渐从幻想走向实际<sup>①</sup>。

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在地图绘制中除了知识的传统之外,还有想象的传统,在这些欧洲古地图上,我们应当注意看的,是地图周围和空白处的一些异域风情画中的想象,这些仿佛《山海经》的关于异族的图像,似乎透露了西方人对于东方的判断。16、17世纪的欧洲人对于东方这个陌生世界,一方面渐渐有了很多新知,另一方面也留存了很多旧闻,新知的实测和旧闻的想象常常掺杂在一起。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亚洲地图》的封面,就画着刚刚打开的亚洲大门口,有一群象征了欧洲人的天使,有的在丈量地球仪上欧洲和亚洲的距离,有的在打开一幅亚洲地图(只是东亚)仔细端详,这种在门口茫然徜

<sup>①</sup> 以上参看海野一隆《地图に見る日本:倭国、ジバング、大日本》(东京:大修馆书店,1999);又,参看《江戸时代古地图总览》(东京:新人物往来社,1997)。



16世纪欧洲地球仪

古代中国常常会沉  
溺在关于「天下」的自  
满的想象里面，这种想  
象常常被批评为中国式  
的无端傲慢和固步自  
封。但是，从这些欧洲  
来的古地图看，这种想  
象是相互的，西洋人对  
于东方也一样，往往是  
好奇加上歧视，想象加  
上想象。

样的状况，就很能反映欧洲人对这块土地的好奇、茫然和幻想<sup>①</sup>。相当多早期欧洲所绘的世界地图、亚洲地图和中国地图中，都有一些关于异域的风情画<sup>②</sup>。

从思想史角度看，这些地图的边缘和空白处附带的各种图像中，最值得注意的，恰恰是里面夹杂的一些异域想象。尽管我们说，那个时代的欧洲人也有对东方和中国的无端崇拜，但也同样有很多充满傲慢的想象，这些没有根据的想象，有时候比起实际知识更能透露心底深处的偏见。在15世纪的《自然之书》(*Buch der Natur*, Augsburg, 1478)中遗留的关于异域的想象，仍然出现在后世，甚至包括地理大发现以后的地图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并不止在中国人这里有，在欧洲人那里也有。像官崎市定收藏的一幅1545年绘制的《亚洲图》(*Map of Asia VIII: Scythia beyond the Imaus*)里面，左边画了上翘一条巨腿的裸形人，右边则画了脸在腹部而无头的两个怪人和一个长了

狗头的人，这是在暗示遥远东亚的异类人种么<sup>③</sup>？在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藏的那幅1493年的早期世界图上，更是画了六臂的、背上长鬃的、有尾巴的、鸟头尖喙的种种怪人，这是不是西洋人对欧洲之外的异域人的想象<sup>④</sup>？过去，我们都知道，在《山海经》以后，古代中国的汉族人是有“天下老子为大”的想法，曾经是这么想象周边世界的，一直到元代周致中的《异域志》、明代的《三才图会》，都曾或写或画了很多这样的怪物，像“狗国”、“女人国”、“无腹国”、“奇肤国”、“后眼国”、“穿胸国”、“羽民国”，这些形象被当做异域人的形象看待，这体现了古代中国一种相当傲慢的、把外夷视为“非人”的观念。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说到这种想象在很长时间里面，甚至比真实的旅行记录更加普遍地被当做关于异域的知识<sup>⑤</sup>。所以古代中国常常会沉溺在关于“天下”的自满的想象里面，这种想象常常被批评为中国式的无端傲慢和固步自封。但是，从这些欧洲来的古地图看，这种想象是相互的，西洋人对于东方也一样，往往是好奇加上歧视，想象加上想象。

地理学史也告诉我们，这种无端傲慢是有历史传统的。中世纪的时候，基督教以自我为中心想象了一个世界<sup>⑥</sup>，标志就是那时候的T-O

<sup>①</sup> 感谢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这部收藏在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的亚洲地图是在2001年一次会议上作为礼物印制出来送给与会者的。

<sup>②</sup> 例如，1593年安特卫普出版的《地球科学》(*Speculum orbis terrarum*)中，中国和日本地图的四周，就画了中国人利用水鸟捕鱼、日本人崇拜十一头菩萨（只画了并排的三个头，但这种画法显然是记忆有误，古代中国、日本崇拜的是十一面观音，并不是并排的三个头）、用风帆的车子、以浮动的围筏养殖等等，表达了当时欧洲人对东方的朦胧知识。而1634—1662年，布莱奥(Joan Blaeu)的《大地图集》(*Atlas Maior or Grand Atlas*)，不仅在非洲地图左右两边画上了十幅当地土著人的图像，也在那幅关于中国北方的地图的右下空白处，画了中国皇帝图像，看上去已经相当准确，这不仅表明欧洲殖民欲望的扩张，也证明这些年间欧洲人对世界各地包括中国有了多少实际的知识。又如，1772年的《亚洲地图》中，不仅有皇帝或王族的形象，而且有各种东方的妇女形象、行刑场面、秋千百戏、攻战交易等等，更表明到了18世纪，经过二三百年的，欧洲人关于东方的知识在迅速增长。

<sup>③</sup> 图见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编《近世の京都图と世界图》(京都：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2001)。本书解说中也指出，这是中世纪世界观残留下来的那种对于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异域的理解(第66页)。

<sup>④</sup> 图见周敏民编《地图中国》，第31页。

<sup>⑤</sup> 参见本书第二章。

<sup>⑥</sup> 中世纪欧洲的世界地图常常把“海洋环绕陆地形成一个O字型，而非非洲、亚洲和欧洲之间被水域分开，构成一个T字型，在这些地图上，耶路撒冷永远位居正中央最显著的位置，因为在《旧约圣经》的《以西结书》中记载，“我已将它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它的四周”。见《地图革命》，载《大地》(台北：1999年11月)第140期。

形地图,在T形世界的中心,是耶路撒冷,上方是亚洲,左下是欧洲,右下是非洲<sup>①</sup>。在那个时代的想象中,亚洲很神秘,像《东方见闻录》里讲的,那极远极远的东方,有巨人、食人族和黑人,而非洲很野蛮,像当时地图上画的,有只眼人、长脚人、无头人、狗头人<sup>②</sup>。这种傲慢与偏见,一直延续很久很久。尽管经过地理大发现,世界越来越全球化了,交通越来越方便,照理说,大家都可以放弃那些怪异和偏执的想象了,可是,偏见常常比知识更顽固,想象常常比观察更流行。即使在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中,也依照西洋地图的惯例,不仅绘上了航海的帆船(象征西洋人的足迹所至),而且画了一些“殊方异物”,比如大鱼、异鸟、怪兽等等,这是否背后有西洋人对异邦的想象?这幅地图上的文字也同样如此,伯西尔(约在今南美洲西北部)是“好食人肉,但食男不食女”、革利国(约在今美国西北部)“惟食蛇蚁蜘蛛等虫”,哥尔墨(在今俄罗斯北部北冰洋沿岸)“死者不埋,但以铁链挂其尸于树林”<sup>③</sup>。这是否杂糅了类似中国古代的《山海经》式的想象和西洋人对异邦文明的蔑视?又比如,在麦卡托—洪第乌斯(Mercator-Hondius)1633年版的地图集里面,那幅分为两半球的世界地图正中下方,就画了亚洲、美洲和非洲三种人的形象,向中间的欧洲人朝拜效忠,象征着欧洲人的自大<sup>④</sup>。即使到了18世纪,这种傲慢与偏见还是没有真的被西方关于

① 参看织田武雄《地图の历史——世界篇》(东京:讲谈社,1974,1994),第52页。

② 参看弥永信美《幻想の东洋》(东京:青土社,1987),第19页。

③ 利玛窦《坤輿万国全图》,见《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图77~80,这幅图现藏南京博物院,并非利氏原绘,而是17世纪初北京重新绘制在六幅屏风上的。

④ 图见菲利普·艾伦(Phillip Allen)编《古地图集精选——透视地图艺术与世界观的发展》,第72~73页。

人类平等的理性驱除,比如1772年戴思诺《亚洲地图》中关于中国的图景,尽管当时流行“中国趣味”,它仍然有的画了赤裸上身的人在荒嬉游戏,有的画了残酷的行刑图,而在说明文字中特意写的是关于中国的“缠足”的事情<sup>①</sup>。这不奇怪,自以为已经很文明的西洋人,对于东方残留的刑罚、东方的风俗,似乎格外有兴趣,这种兴趣背后是一份对自己文明的自信,一份对异族的好奇加上一份无端的鄙夷。

难怪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要写他那本《东方学》,愤愤然地批评西方人在想象中建构了一个“东方”,他说那是西方人“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sup>②</sup>。

## 二 从天下到万国:古代中国华夷、舆地、禹迹图中的观念世界

一般来说,在研究文字文献比较缺乏的时代,比如上古史的时候,使用图像资料似乎不大有人反对,像新旧石器时代考古报告里面关于早期祭祀坑、墓葬、陪葬品等等,这是因为无可奈何。但是,在文献足征的时代,思想史研究是否可以大量使用图像呢?思想是一种容易消失的东西,如果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是思想史的基本文献,那么,同样要用思想来生产的图像,为什么不可以同样当做思想的叙述文

① 图见前引《近世の京都图と世界图》,第66页。

②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东方学》(*Orientalism*)(王宇根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99),第4页。

地图的几个要素，像方向、位置、比例、示意的色彩以及国家的边界等等，会随着观念的变化而变化。

本？关键的问题只是在于，思想史研究者如何从这些只有空间性的图像中，诠释出思想史需要的观念意义。

回到地图上来，我们都知道，地图表述的是空间。一般来说，地图上的空间有三类：（1）在自然世界中，空间主要只是“物理空间”（space），比如地形、植被、矿产、气象等等。（2）在政治世界中，空间主要只是一个和领属关系相关的地域（domain），比如国界、省界、政治中心。（3）在人类社会，有很多人生活需要的空间布局，比如城市、集镇、交通路线等等。所以，在传统地图上落实的，常常也是这三者。

但是地图上的这个“空间”绝不等于是一个空间的客观描述。因为，被描述的任何图像，不仅涉及到“它”，就是面前的具体空间物像，而且关涉到“我”，就是描述者的位置、距离、方位，甚至关涉到描述者历史形成的观看方式，像作为地图的《万里长江图》，就仿佛是把若干个不同时间和地点的长江视觉图像连缀起来，在一幅长卷的画面（也就是同一时间和空间）中呈现，而决定这种对长江数千里地势的观看和理解的，还包括这种长卷地图的展开方式。我们通常会说，从某地到某地是多少天多少小时的路程，就是把空间距离转化成时间来计算和表达，而《长江图》则是把多少小时多少天所看到的图景，在瞬间同时平行呈现于多少尺多少寸、逐渐展开的地图中，这是把时间转化为空间<sup>①</sup>。其实，在地图里面，已经把“空间”人为地转化了，

<sup>①</sup> 参看章潢《图书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五八《万里长江图》，第3页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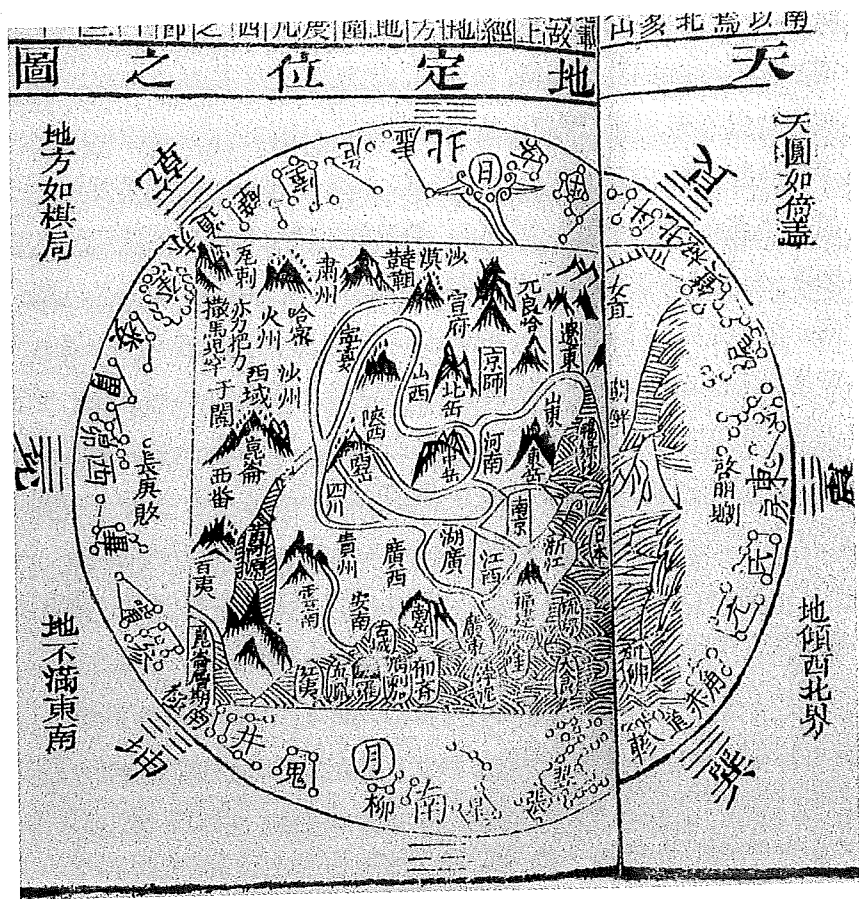
不再是纯粹客观的“空间”了<sup>②</sup>。

所以，千万不要相信地图会百分之百地“还原真实”，其实，这只是某一个视角的“有限真实”，就连这种“有限真实”也很有问题，通常我们说地图的几个要素，像方向、位置、比例、示意的色彩以及国家的边界等等，会随着观念的变化而变化。比如方向，是固定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还是另有设计？位置，本来地理上的位置是固定的，但是是否会有意外的挪动？比例，精确的比例虽然一直是地图的必要因素，但是难保某种意图下的地图绘制者会有意改变。最后是色彩，同一色彩是同一个政治领土的标志，不同色彩则标志着不同的领土，可是会不会有别有目的的绘制者用色彩暗示着某种政治意图？至于边界，更是地理上没有而只是出现在地图上的线条，这种边界圈起来的版图的形状，会不会引起另类的政治联想<sup>③</sup>？对于空间的主观感觉和印象，有几个因素影响很大。首先是立场，从一个方向看过去，就有了依照观看者立场确定的左右上下。其次是感觉，根据观察者自身感觉而来的比例，确立了描述物像的大小。再次是距离，地理上“远”

<sup>①</sup> 比如，重视交通的，会凸显道路而忽略其他；关心古今沿革的，会忽略物产而凸显城镇关键的变化。堪舆家的地图，注意的是朝向、方位和龙脉之所在；旅行者的地图，关心的却是旅游景点和 shopping 地点。一般来说，古代的历史地理学主要关心官府所在（州、县、郡的治所）和行政地理范围的变化，明清易代的时候，像顾炎武、顾祖禹，就特别关心军事要塞和险要地势，这是因为心中还存在着战争的记忆。可是，古代那些非常重要的甘肃嘉峪关、秦岭大散关、河北居庸关、四川剑阁，在今天的军事地图中，已经不是人们视野的焦点，像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就使15世纪以来航海图中，相当重要的好望角也不再凸显。所以我们说，绘制地图的观念，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

<sup>②</sup> 参看葛兆光《思想史视野中的图像》，载《中国社会科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2002年第3期。





天圓地方之《天地定位之圖》

和“近”也一样与交通能力相关。最后是颜色，地图对空间的色彩安排，背后有对政治领土的承认。所以，我们说，人画出来的地图在某种意义上，既是以“我”为中心的主观视图，又是以“它”为基础的客观视图，现代地图中对于地理空间的描述，据说，很符合理性、科学和客观，其实并不一定，在被人们如此这般地描绘了以后，地图就成了主观叙述，有了凸显和隐没，有了选择与淘汰，在描述者的观看、想象、回忆、描述中，携带了人的感觉甚至观念。所以，地图的地理想象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政治和文明的想象，在这种想象的历史里隐藏着很多观念的历史，因此它是思想史的内容。

这里来看一下古代中国地图里所持有的关于“天下”的想象和观念。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有一种“天圆地方”的特殊空间感觉，它形成也相当早。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濮阳蚌堆龙虎、曾侯乙墓漆箱盖上的二十八宿、北斗和龙虎图案，各种墓室顶部接二连三地出现的天文图像，加上古代仿效天圆地方用来占验的“式盘”、指示方向的司南，以及如《禹贡》、《周礼》等经典文本中想象的五服、九服、九州等方形的大地，都表示古代中国关于“天圆地方”这种观念的普遍存在，而这种观念，又形成了古代中国自居天地中央的观念。以前我在很多论文里都讨论过，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地格局，大体上就是，第一，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第二，大地仿佛一个棋盘一样，或者像一个回字形，四边由中心向外不断延伸，第一圈是王所在的京城，第二圈是华夏或者诸夏，第三圈是夷狄；第三，地理空

整个传统时代，除了佛教以外中国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文明挑战，中国人始终相信自己是世界中心，汉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顶峰，周边的民族是野蛮的、不开化的民族……

间越靠外缘，就越荒芜，住在那里的民族也就越野蛮，文明的等级也越低，叫做南蛮、北狄、西戎、东夷<sup>①</sup>。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人一直对这一点很固执，固执的原因是，整个传统时代，除了佛教以外中国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文明挑战，中国人始终相信自己是世界中心，汉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顶峰，周边的民族是野蛮的、不开化的民族，除了维持朝贡关系之外，不必特意去关注他们。所以，古代中国的世界地图，总是把中国这个“天下”画得很大，而把很大的世界万国，画得很小。古代的《华夷图》、《禹贡图》、《地理图》，像宋代留下来的那几幅地图，有的叫“华夷图”，就是华夏加上四夷；有的叫“舆地图”，就是说舟车可至的地方。但是，画的还是以当时的汉族中国为中心的一圈，尽管有时也把周边国家画上，但比例很小，小得好像它们真的是依附在中国这个大国身上的“寄生”物。

这种地图画法的传统一直到明代仍然延续。应当注意的是，中心大而边缘小，实际上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的问题，而且也是在分辨价值的差异，更是在确认“自我”与“他者”，地图上的中心与边缘也一样。这里我要解释一下。第一，这和中国人对于世界的实际知识没有关系，汉代张骞以后，欧亚大陆交往已经有丝绸之路，唐代中国与外界交往更多，元代帝国的疆域几乎无远弗届，当时从阿拉伯来的札马鲁丁还制造过三地七水有经纬线的“地球仪”，到了明代初期郑和下

<sup>①</sup> 参看葛兆光《天下、中国与四夷——古代中国世界地图中的思想史》，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第十六卷。

西洋，已经到过了非洲的东岸，实际经历的空间也远远超过了中国本土无数倍，人们知道的各种文明的情况也已经很多，但是古代中国关于“天下”、“中国”、“四夷”的思想与想象却始终没有变化<sup>①</sup>。第二，这和古代中国人了解地理和绘制地图的技术也没有关系。古代中国人其实地理水平很高，绘制地图也很高明，1974—1978年在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发现的铜版《中山王陵兆域图》，1986年在水放马滩发现的秦代木牍地图，马王堆汉墓发现的画在帛上的地图，都相当有水平<sup>②</sup>。所以，这只能从观念上面去理解，因为这种地图背后是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念”或者说是“世界观”，在影响着天下地图的绘制。换句话说，就是一方面，古代中国这种“天圆地方”的空间观念，使中国人想象自己处在天下之中，周围只是小小的蛮夷；另一方面，古代中国的华夏文明中心观念，使中国人想象四周的国家不仅是地理空间小，而且也是文化价值小。

正因为如此，16、17世纪之间，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才给中国造成了极大震撼。因为它告诉中国人，第一，人生活的世界不再是平面的，这瓦解了天圆地方的古老观念。第二，世界非常大，而中国只居亚细亚十分之一，亚细亚又只居世界五分之一，中国并不是浩大无边的唯

<sup>①</sup> 例如龙谷大学所藏1402年李朝朝鲜复制中国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关于非洲部分的知识就相当令人惊异和费解，因为它对于非洲西岸的描绘相当准确，远远超过同时欧洲人的知识。此据小川琢治1910年复制本，见《学びの世界——中国文化と日本》（京都：京都大学综合博物馆，2002），第5~6页。

<sup>②</sup> 据专家的研究，马王堆帛书地图的主图部分描述的是湖南潇水中上游，比例约为十万分之一，相当精确。参看谭其骧《两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载《马王堆汉墓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  
给中国思想世界带来了  
一个隐性的、巨大的危  
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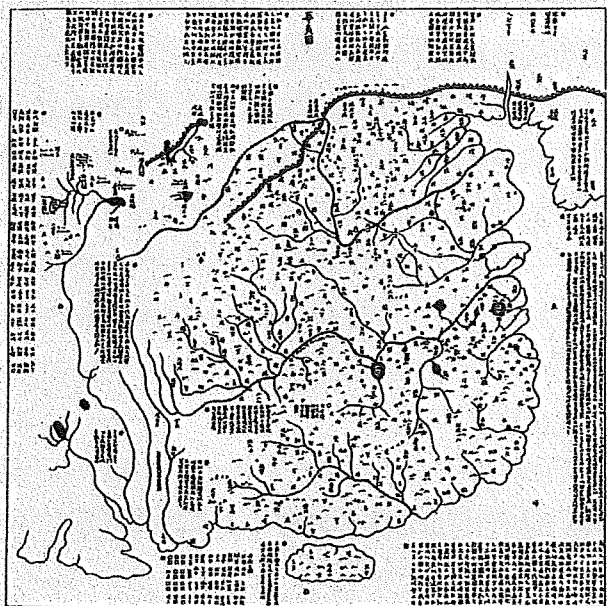
佛教有两个关于空  
间的观念，和中国人是  
很不一样的。

一大国，反而很小。第三，古代中国的“天下”、“中国”、“四夷”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中国不一定是世界中心，四夷则有可能是另一些文明国度，在他们看来，中国可能是“四夷”。第四，应该接受“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想法，承认世界各种文明是平等的、共通的，而且真的有一些超越民族/国家/疆域的普遍主义真理。正是这些颠覆性的观念，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给中国思想世界带来了一个隐性的、巨大的危机，因为它如果彻底被接受，那么，传统中华帝国作为天下中心，中国优于四夷，这些文化上的“预设”或者“基础”，就将“天崩地裂”。

### 三 佛教地图：另类世界的想象

需要追问的是，难道古代中国没有另外的“天下观念”吗？应该说还是有的，那就是佛教的“世界观”。关于佛教的历史和影响，不是这篇小文可以讨论清楚的，这里要说的只是佛教的世界观，佛教有两个关于空间的观念，和中国人是很不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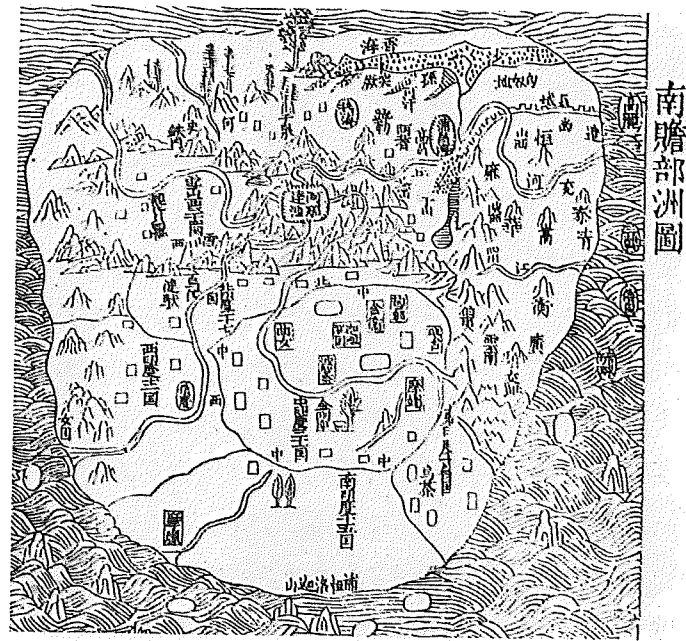
第一个是包括更广的佛教的整体世界。按照佛教的说法，世界并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大块，而是四大洲，中国只是在其中一洲。据佛经说，在须弥山的四周，围绕着四大部洲，而中国在南赡部洲，其他还有东胜身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据《长阿含经》、《楼炭经》、《法苑珠林》等说，日、月、星辰都围绕于须弥山中，普照天下，四大洲各有二中洲与五百小洲，四大洲及八中洲都有人居住，二千小洲则或住人或不住人。其中北洲的果报最胜，乐多苦少，寿命千岁，但是，那里



华夷图墨线摹本

不会出现佛陀这样的伟大领袖；南洲的人民勇猛、强记，但是有业行，也能修梵行，所以会有佛出世；东洲的空间极广大，而西洲则多牛、多羊、多珠玉，仅仅是一洲上面，大国就有三十六，小国就有二千五百，而且“一一国中，种类若干，胡汉羌虏、蛮夷楚越，各随方土，色类不同”<sup>①</sup>。请注意，这和中国的天下观念就不同了，中国不是唯一的天下了，天下要比传统的想象大得多，这倒是和以前邹衍说的“大九州”有一点像，所以后来这种四洲、九州的说法，成了古代中国人接受新世界图像的一个资源。

第二个是佛教的世界中心观。由于佛教是从印度经过中亚或南亚传来的，所以，一般来说，佛教徒或明或暗都会反对中国作为唯一中心的世界观念，这道理很简单，如果中国是唯一的，那么印度佛教将如何自处？既然佛教来自天竺，真理出自印度，那么，印度当然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在南北朝的佛道儒论辩中，佛教曾经对世界有很多描述，也曾经论证过天下之中在印度<sup>②</sup>，可是，由于佛教在中国，渐渐便放弃了这一绝对的说法，改而说有印度和中国两个文明中心，或者进一步说世界有多个并列的中心，其中很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四方还有四天子，4世纪末的《十二游经》、6世纪的《经律异相》卷三、7世纪的《法苑珠林》卷四四中，都有这种说法，“东有晋天子，人民炽盛，南



《南瞻部洲图》中，中国仅仅在东部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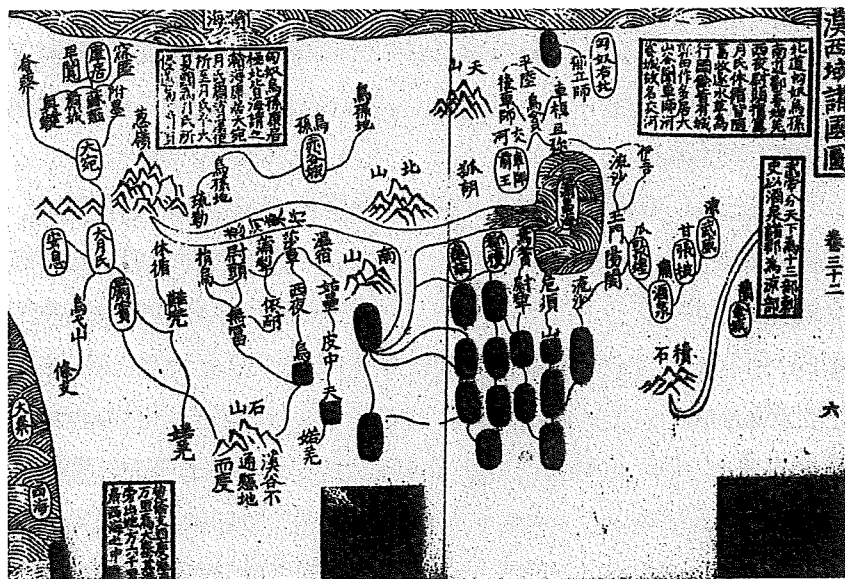
<sup>①</sup> 参看《法苑珠林》卷二《界量部第五》，《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三卷，第280~281页。

<sup>②</sup> 僧祐《世界记目录序》，载《出三藏记集》卷一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五卷，第88页。按：僧祐《世界记》五卷已佚，其目录幸好保留在僧祐自己的《出三藏记集》卷一〇中，主要是来自《长阿含经》和《楞炭经》，第一卷讲三千大千世界、诸海、大小劫、大海须弥日月、四天下、四种姓，是佛教世界观的重要资料。

尽管后来佛教中国化了，变成了三教合一，甚至屈服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儒家学说，但是，它曾经使中国文明天下唯一的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有天竺国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国天子，土地饶金银璧玉，西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马”，而7世纪玄奘的《西域记》的序文、道宣的《释迦方志》、《续高僧传·玄奘传》中，也有南瞻部洲四主的说法<sup>①</sup>。无论如何，这幅世界图像就和传统中国只是围绕中国这个“天下”的不一样了。以前正如《诗经》所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或者像《孟子》所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但是，如果接受佛教的说法，观念中的世界将会大大不同了。

尽管后来佛教中国化了，变成了三教合一，甚至屈服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儒家学说，但是，它曾经使中国文明天下唯一的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佛教传来的时候，一些中国人不能不承认“华夏文明不是唯一”，“天下不是中国正中”，这本是一个重新认识世界的机会，然而这一契机并没有成为现实，佛教坚持的世界观念，只是留存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之中。我们目前看到的，在古代中国唯一不以中国为天下正中的地图，一是《佛祖统纪》中的三幅图，在宋代以前，这是极罕见的多元世界观，它的《东震旦地理图》、《汉西域诸国图》、《西土五印之图》构造了同时拥有三个中心的世界<sup>②</sup>。二是包括了印度、中国、西域在内的《佛教法界安立图》。应当说，佛教关于须弥山、四大部洲以及兼容中印的南瞻部洲的地理空间观念，在近代以后，也曾经



《佛祖统纪》之《汉西域诸国图》

① 参看伯希和《四天子说》，原载1923年《通报》，冯承钧译，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北京：商务印书馆重印本，1995）第一卷第三编，第84~103页；烈维（S. Levi）《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冯承钧译，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卷第九编，第160~234页。

② 志磐《佛祖统纪》卷三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九卷，第312~314页。

给中国、日本、朝鲜提供了改变世界观的潜在资源。比如在日本和朝鲜，人们就一方面接受西洋新的地理知识，一方面回忆佛教的世界观念，因此用了佛教须弥山的旧闻加上西洋五洲的新知，画了新的世界地图，像神户市立博物馆藏1709年日本制作的《南瞻部洲万国图》，首尔所藏1775年朝鲜制作的《舆地全图》，就是把西方知识和佛教想象混在一起的。在这里，世界不再只是一个中国中心，对日本和朝鲜人来说，这下子就确立了东洋（中国）对西洋（欧洲）以及自身（日本或朝鲜）的万国图像。

不过我得说明，这种冲击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国人的世界观，佛教中国化了以后，中国佛教就很少再提这一话题了。在中国，佛教观念的笼罩和影响，远远没有在日本大，它还是屈服在儒家意识形态下面的，所有的一切都要先经过儒家的和官方的尺子量一量，所以，关于世界的想象，还是要再过几百年，直到已经充分世界化了的16世纪，西洋人来到中国，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就是前面我们说的，直到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万历十二年，1584）在广东问世，中国人才真正开始看到了“世界”，在思想上出现了“天崩地裂”的预兆。

#### 四 内诸夏而外诸夷：以明代海防地图为例

关于地图的方向，我曾经有一次深刻的经验。有一次，一个朋友拿着一张绘制了某个海岸线的地图给我辨认，这个地图没有地名、城市、交通等等容易辨认的东西，光是地形，我实在不能看出它是什么



宁波船主汪晴川图（东北大学藏）

古代中国通常要分内、外即所谓「华」、「夷」，这在宋代以后成为特别敏感的话题，古代中国人对于自我和他者有很清楚的也是很严格的观念，「华」是「内」，「夷」是「外」。

地方的海岸。但是当朋友把地图旋转90度的时候，我发现它就是我非常特别熟悉的中国东海沿岸，这只不过是一张上东下西、左北右南的地图。这件事情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它只是说明，人的感觉常常是有先入之见的，而且这种先入之见相当深，甚至成为认知的习惯。不过，如果我们知道，古代的地图曾经是上南下北，那么我们就应当追问，究竟为什么人们要把它改成以及什么时候改成下南上北的？如果说这一问题不易有结论，那么我们再看，当人们已经习惯了上北下南地绘制地图以后，明代关于海防的地图为什么又改变习惯而变成上东下西或上南下北？

我们知道，海防对于中国来说，本来并不是大问题，但是到了明清，却变得很重要很重要，因为这个时代，外患主要是从海上来，无论是倭寇还是洋人都要从海上来，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个“海防时代”，所有的军事重心都在沿海，所以，在明代有很多关于海防的地图绘制出来。比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胡宗宪的《筹海图编》和万历十九年（1591）李化龙序刻的《全海图注》，以及稍后的谢杰《虔台倭纂》卷上的《万里海图》<sup>①</sup>。可是注意看，很有趣也是很特别的，就是这些关于海防的地图，往往并不按照习惯的北上南下，而是大多数都把中国大陆绘在下方，而把可能入侵的日本以及大海等放在上方，变成上东下西或者上南下北，而且在中国沿岸画上了警戒的旌旗标志和密密麻麻的烽墩营寨，看上去方向总是一致向外，这里面究竟是什么道理？

<sup>①</sup> 《筹海图编》有嘉靖四十一年（1562）刻本，《全海图注》有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九年（1591）李化龙序刻本，《万里海图》见谢氏《虔台倭纂》卷上，玄览堂丛书集影印明万历刊本。

么道理？

曾经帮助胡宗宪编过《筹海图编》的郑若曾在《郑开阳杂著》卷八《图式辨》中的一段话相当有意思，他说：

有图画家原有二种，有海上而地下者，有地上而海下者，其是非莫辨。若曾以义断之，中国在内，近也，四裔在外，远也，古今画法皆以远景为上，近景为下，外境为上，内境为下，内上外下，万古不易之大分也，必当以我身立于中国而经略夫外裔，则可，若置海于下，则先立于海中，自列于外裔矣，倒视中国，可乎？<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关键是“内”、“外”、“上”、“下”，与“中国”、“四裔”的分别，稍通古书的人都知道，古代中国通常要分内、外即所谓“华”、“夷”，这在宋代以后成为特别敏感的话题，古代中国人对于自我和他者有很清楚的也是很严格的观念，“华”是“内”，“夷”是“外”。这是古代经典中的一个重要观念，稍通经学知识的人就知道《公羊传》在古代中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讲“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夷”，古代中国的“夏”就是“雅”，就是文明，就是我们，就是“内”，而夷狄就是“蛮”，就是不文明，就是“外”，这里有严格的亲疏远近的差异，所以就要“分”。

其实，到了明代，中国绘制地图从最早的南上北下，早已经调整为

<sup>①</sup> 《郑开阳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八，第8页A-B。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绘制地图的方向，在当时人心目中，“内”、“外”、“上”、“下”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国家的认同和排斥，确立自我和他者的问题。

北上南下，之前宋元两代绘制者都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向。郑若曾也承认，北上南下乃是通则，他也看到了通常地图不嫌北狄在上的事实，从理论上说，北狄也是“外”，甚至郑若曾也可以接受“天地定向，以北为上，以南为下”的说法，就是在他的其他著作中，绘制普通地图也同样遵循北上南下的规则，比如《筹海图编》中凡普通的行政区地图都是按照上北下南的规则。但是，一旦涉及到国家与民族，一旦国家与民族遇到外敌，他一定要坚持这种“内外有别”的画法，像《郑开阳杂著》卷四的那幅东海图，就是把日本放在上方正中，而把明帝国放在下方，不仅在海洋上注明“倭寇至直、浙、山东诸路”和“倭寇至朝鲜、辽东之路”，而且在下方陆地——注明倭寇入侵的路径<sup>①</sup>，而他所参与编纂的《筹海图编》中凡普通的行政区地图是按照上北下南的规则，但海防图则是按照海上地下的原则来画的，以同为描述福州的卷四《福州府境图》的上北下南和卷一《海防图·福建七》的上东下西对照，以同为描述广州的卷三《广东沿海总图》的陆上海下和卷一《海防图·广七》的海上陆下对照，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sup>②</sup>。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绘制地图的方向，在当时人心目中，“内”、“外”、“上”、“下”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国家的认同和排斥，确立自我和他者的问题。顺便说明的是，这不仅是古代中国的习惯，1930年，日本军方绘制了《中国沿海图》，绘制的日本人也同样不管东西南北的地



郑若曾《万里海防图》第二幅（广东）

① 《郑开阳杂著》卷四，第4页A。

② 参看王庸《明代海防图籍录》，收入王庸《中国地理图籍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1956），第92~122页。





然“比年以来，差调烦重，岁事不登，逃亡消乏，户数减少”，但是《至顺镇江志》中仍然记载有“隅七”、“坊二十八”、“市五”、“街七”、“巷八十二”<sup>①</sup>。可见城市里面毕竟还是民众的生活空间大。

不过，奇怪的是有关城镇的方志地图并不能帮助我们对当时城市空间的想象。通常，在我们的知识中，地图应当按照实际空间比例绘制，地面上占的空间多少，地图上就有相应的大小。可是，明代各种方志卷首虽然有不少关于城市的府县图，反复看去却发现现代的常识和古代的地图方柄圆凿，明代方志地图上，在凸凹相间的那一圈城墙之内的——这些地图通常都是以仿真画法的城墙把城区标志出来的——只是若干政治与宗教的公共建筑，却没有多少集市、街坊和其他私人生活空间。在这些地图里，最醒目也是常常在城市中心的，是府县官署衙门的所在，这是政治权力的象征<sup>②</sup>。

其实，在宋代并不全是这样的，“自大街及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sup>③</sup>，看看《梦粱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就知道，那时的城市生活不是这样冷冰冰的了无生气，倒像《清明上河图》里画的那般热闹。不止是都城，各地的城镇都一样，人们熟

①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卷二，第13~16页。

② 如在《（嘉靖）抚州府图》中，凸显的就是抚州府、临川县的所在，以及左边的按察司、兵备道，加上右边的府学，而《（嘉靖）惟扬志》的《今扬州府并所属州县总图》中，民物繁庶的扬州城也只画了扬州府、江都县、察院的官邸，《（嘉靖）嘉兴府图记》里的《秀水县境图》，从名字上说虽然是县境，但图中却只有布政司、千户所、按察司、府学等等公家场所，而《（正德）大同府志》的地图，则更醒目地标志着“代王府”、“山西行都司”和“帅府”。它们被显著地标志出来，透露着绘制图志的人心目中，政治、法律和权力，它们有多么重要。

③ 吴自牧《梦粱录》（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卷一三，第178页。

悉的宋代《平江图》碑刻，毕竟还是大体按照比例绘制，街巷城坊还是一一被标志出来的，而在《（淳熙）严州图经》的“建德府”一图里面我们也看到，除了一些被隆重标志的官衙之外，多少还留下了民居的位置<sup>④</sup>，大约有十来个坊，虽然在巨大的官府公廨的压榨下，坊巷市集已经变得微不足道，可是，就算是这样，还勉强能够指引人们想象古代城市的空间分配，而《咸淳临安志》里的《临安图》，更在西边并不很大的大内之外，大体按照空间比例画出了当时临安的民间生活空间，让人一看上去，还知道这是一个民宅多于官府，生活大于政治的活生生的城市。可是，在明代地方志的城市地图里面，这种画法却很少见<sup>⑤</sup>，对于民众生活的空间，也有些有意无意的忽略。

第二个是以阴间官配阳间官。除了政治建筑之外，在明代方志地图上被隆重标志出来的还有一些宗教性建筑，这指的是合法宗教的寺庙和被认可的祭祀场所，不包括不经批准的“淫祠淫祀”。这些宗教性建筑常常被显著地标识在方志的地图上，显而易见，这些祭祀供奉神灵的场所，在当时的官员和士绅，以及编写方志的士人眼中，和公廨衙府一样，也可以算是“公共”的“空间”。于是，在明代方志图上，几乎每一个城的城隍庙都被清楚地画出来<sup>⑥</sup>，当然，每幅地图上也都有

④ 像东面的福善坊、建安坊，中间的政惠坊、亲仁坊、辑睦坊和甘棠坊，西面的肃民坊、和兴坊等等，见（宋）陈公亮《严州图经》（丛书集成影印本），第3165册，第4~5页。

⑤ 我所看到的，有沈朝宣编《（嘉靖）仁和县志》的卷一，还有坊隅街巷牌坊市镇的内容，卷二记载有桥梁方面的内容，但这可能只是继承宋代杭州（临安）地志的余风，通常明代方志地图，很少标志民众日常生活的空间。《（嘉靖）仁和县志》，见《四库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影印本）史部第194册。

⑥ 于凤喈、邹衡《（正德）嘉兴志补》卷首，《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185册，第221页。



在方志地图上特意标志出来的这两类建筑，象征了古代到现代，中国政治权力的用力所在。

大概可以证明，从宋代以来，这一类应付灾难的设施，已经成了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

不过，除了设仓济饥，承担养育之外，在古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和官员，似乎还特别讲究教育，“移风易俗”好像总是儒生出身的官员的责任，因此在地方志上还有一类建筑在地图中占了不少位置，这就是府学、县学和书院。其实，当时并不止是官办的学校，从宋代起，民办的地方学校已经很多，《都城纪胜》“三教外地”条就说到，“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不过画方志地图的人眼睛里面盯着的，却还是这些官方的设施，尽管孟子当年也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是毕竟自古以来中国都是“官”比“民”重。因此，各地官方建立的教育机关，在地图上被给予了仅次于官署府廨的空间位置，大多方志图经中都不会忘记它们的存在，像前面说到的《嘉兴府图记》中的《秀水县境图》里面，除了千户所、按察司这些官衙之外，单独标出的就是府学，而在《（万历）湖州府志》中，不仅有府学、有归安县的县学，还有著名的安定书院，那是胡安定的遗风所在<sup>①</sup>。

在方志地图上特意标志出来的这两类建筑，象征了古代到现代，

<sup>①</sup> 《（万历）湖州府志》卷一，《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191册，第8页。这种政治智慧源远流长，即使在满族当家的清代，这一汉族政治的传统依然延续，清代方志地图也还是这样，像1831年修《衢州志》的卷首地图，除了官方公廨官署外，城市中间一字排开的，就是书院、天宝观、公输庙、学署、文庙，周围一一标志出来的，就是关帝庙、城隍庙、观音庵、般若庵、真武庙等等，此图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转采自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2, Book.2: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Edited by J.B.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中国政治权力的用力所在。有了“物质食粮”，百姓心中不慌，秩序当然就安定；有了“精神食粮”，知识人有做进身之梦和发发大议论的场所，也有在那儿讨论绝对真理的空间，士居四民之首，有了进得去的学校和望得见的官署，大概也不再会意马心猿、惹是生非。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曾经说过，西方城市的中心“常常是满满的，一个显眼的地方，文明社会的价值观念在这里聚合和凝聚：精神性(教堂)、力量(官署)、金钱(银行)、商品(百货公司)、语言(古希腊式的大集市：咖啡厅和供人散步的场地)”，而在日本东京，他却看到一个空的中心，而正是这个空的中心，“隐藏着那个神圣的‘空无’”，“以它那种中心的空洞性来支持整个城市的运动”，他在城市空间设计中看到了它的意识形态象征性<sup>①</sup>。同样，在明代方志图经中重点凸显的是官府衙门(政治权力)、宗教寺庙(宗教权力)、学宫官仓(文化与经济权力)，也一样呈现着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没有了坊巷，没有了市集，没有了娱乐场所，这透露着绘制者视界中仿佛目中无“人”，绘制方志地图的人仿佛都那么大“公”无“私”，没有民众的生活，没有私人的空间，它就仿佛在说，如果把方志地图当做一个思想史的隐喻，那么，它暗示的也许是，这个时代“国家”越来越显得专制，“公”全面压倒了的“私”，甚至取消了“私”，在府廨、寺庙、学宫、官仓等等政府设施的背景中，日常生活和私人空间在这些士大夫所绘制的地图里，已经全面消退，似乎越来越没有重要性了。

<sup>①</sup>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符号禅意东洋风》(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孙乃修中译本，第45~48页。

很多历史记忆，不仅是写在文献中的，也是储存在图像里的。很多思想观念，也不一定只是直接用文字表达，有时候它也支配着图像的绘制。既然绘制图像包括地图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会影响他对方位、比例、位置和色彩的选择，那么，在不同图像或地图上，就一定残留着不同的思想观念。

## 六 小结

索雅 (Edward Soja) 曾经说到，地理学应有三个维度，第一个是历史性 (historicity)，第二个是空间性 (spatiality)，第三个是社会性 (sociality)<sup>①</sup>。就是说地理学包括地图的绘制，都要考虑历史影响下的空间观念、空间观察的位置和立场、社会语境的影响。我觉得，阅读地图似乎也是如此，在一份地图的不同空间描述上，可以看到绘制者本身的文化史，我们可以看到绘图者区别“自我”和“他者”的立场，可以看到绘制者心中的“世界”，以及关于这个世界的“观念”，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没有明说的政治意图和各种观念，尤其是在对同一个世界的不同描述的地图中，更可以看到各种阶层和民族的观念差异。这正像一句名言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不同于他人的世界”。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在本文开头我说，“怎样才能从地图中看出思想史，或者说，古舆图如何作为思想史的资料？”这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地图在思想史中的使用，其实并不应当有问题。很多历史记忆，不仅是写在文献中的，也是储存在图像里的。很多思想观念，也不一定只是直接用文字表达，有时候它也支配着图像的绘制。既然绘制图像包括地图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会

<sup>①</sup> Edward Soja: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1989. 参见王志弘《后现代的空间思考——爱德华·索雅思想评介》，载《流动、空间与社会》(台北：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第17~33页。

影响他对方位、比例、位置和色彩的选择，那么，在不同图像或地图上，就一定残留着不同的思想观念。所以，对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在扫描和追寻历史上的思想观念的时候，图像和文字的功能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我在一篇旧文中曾经说过，“问题只是在于：我们怎样透过地图诠释出古人的所思所想，怎样把无言的图像转化为有言的历史”<sup>①</sup>。

<sup>①</sup> 《古地图与思想史》，载《二十一世纪》(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0年10月)总第六十一期。

## 【附录】 谜一样的古地图

日本的神宫佛寺很幽静，不像中国道观佛寺那样游人如织，树荫浓密得似乎隔断了尘世喧闹，也衬托出一种谜一样的深不可测。这些深深的神宫寺院里，也不知道为什么，常常会藏了些稀罕的古物，时不时拿出三件两件，便让历史生出几许波澜。我猜测是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日本人神佛敬畏比中国人厉害。在中国，政治重于宗教，政治战争一来，就顾不上泥塑木雕的神佛，不光是“烟横古道人行少，月堕荒村鬼哭哀”，道观佛寺也难得幸免，史书里少不了用“玉石俱焚”、“鸡犬不留”这样的成语；可是，日本的神宫佛寺常常延续千年，像奈良的东大寺、招提寺等等，就至今依稀唐貌。一是日本人爱惜东西的传统比中国更甚，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家大业大满不在乎，一把火就可以把阿房宫烧个三天三夜，他们把自家的东西和外来的东西，一件又一件地小心翼翼地藏起来，看宫崎市定《谜の七支刀》，就惊讶于《日本书纪》里面记载的一千六七百年前百济国王赠与倭王的那一柄七支刀，还能从石上神宫的库房里重新发现<sup>①</sup>，中土佚失已久的王羲之《丧乱帖》，居然也藏在日本皇宫里面，在千余载后，重新

<sup>①</sup> 原为1983年出版的“中公新书”之一，后收入《宫崎市定全集》（东京：岩波书店，1993）21《日本古代》。

借给上海博物馆展览，让中国人开了眼界。老话说“礼失求诸野”，现在想想，古代中国文物丢了，或许也可以求诸东邻。难怪宋代欧阳修就心情复杂，这样说日本的收藏：“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sup>②</sup>

下面要说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便是原本深藏在日本京都西本愿寺，后来归了西本愿寺创办的龙谷大学图书馆的，一幅充满了谜团的古地图。

### 一 令人惊异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这幅古地图里面有什么奥秘，让我们今天不能不郑重面对？

也许，人们还记得前几年一位英国退休船长，也是业余历史爱好者的孟席斯（Gavin Menzies），他的一本书《1421——中国发现世界》（*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曾经惹起的一场风波<sup>③</sup>。据他说，是中国的郑和而不是欧洲的哥伦布、麦哲伦发现了世界，这个来自西方口惠而实不至的说法，也许满足了国人久已欠缺的自信和自尊，所以很多国人都相当激动。记得那一年我在香港参加一个讨论会，凤凰卫视的一个主持人听了会上一些不同于孟席斯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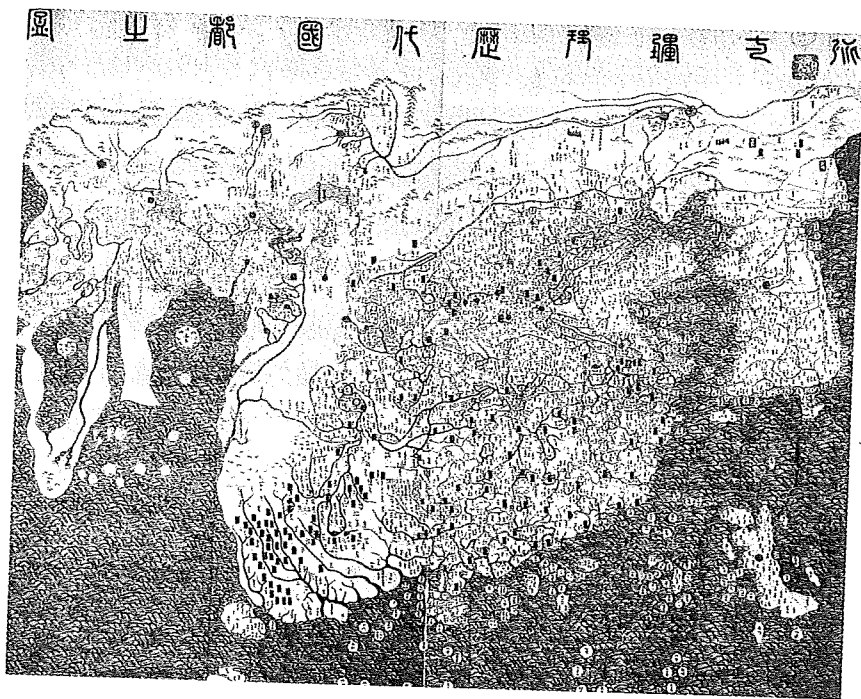
<sup>②</sup> 欧阳修《日本刀歌》，《欧阳修全集》卷五四，第767页。

<sup>③</sup> 孟席斯（Gavin Menzies），《1421——中国发现世界》（*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中文本，台北：台湾远流公司，2003）。

居然指责学者说：“你们谁能像他那样满世界去找资料？”孟席斯船长满世界找资料？这满世界找的资料之一，就是这幅《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呀。因为他要证明中国人到了美洲，可中国人到美洲就得绕过非洲好望角，而这幅绘于郑和下西洋之前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恰好画了下垂的阿拉伯半岛和倒锥形的非洲，倒锥形的顶端就是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所以这幅古地图成了他的重要证据之一。据他说，有一种难以证实的传说，这幅古地图曾经被一个叫做孔蒂（CONTI）的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带回欧洲，因此才有了后来的“大航海时代”，有了哥伦布和麦哲伦……

孟席斯的是非曲直不必在这里叙说。其实，这幅地图不是他的发现。一位日本历史地理学家，那个膝下有着中国历史学家贝冢茂树、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中国文学语言学家小川环树三个优秀儿子的京都大学教授小川琢治，在20世纪初的1910年，就已经发现这幅地图，并且摹写和解说过它，一百年前摹写的地图，至今保存在京都大学<sup>①</sup>。孟席斯说郑和发现世界，这幅地图并没有给他提供太多的证据，但是这幅古地图本身，倒是真的让人寻思，因为这里有一连串的疑问。葡萄牙人迪亚士（BARTOLOMEU DIAS，约1450—1500）是1488年才绕过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当时曾命名为风暴角CABO TORMENTOSO，后来才改为喜望峰C.DE BOA ESPERANZA）的，达·伽马（Da Gama, Vasco，约1460—1524）要迟到1497年才绕过好望角到达印

<sup>①</sup> 我曾经请京都大学教授平田昌司向研究者杉山正明教授询问过，据说此摹本至今由京都大学地理研究所保管。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自我中心主义是哪  
个民族都免不了的，把  
自个儿放在中心去想象  
周边，并不只是中国人  
的习惯，自我夸张和自  
我放大也常常是凸显自  
信和自豪的策略，甚至  
无意识中也会如此。

## 二 蒙元时代的世界新知识

这幅明建文帝四年（1402）画于丝织物上的地图，长150厘米，宽163厘米，古色古香，至今仍然藏在京都龙谷大学的附属图书馆中。据地图下方李朝朝鲜初期官员权近的跋文<sup>①</sup>，我们知道，原来那时有一个叫金士衡的朝鲜左政丞和一个叫李茂的朝鲜右政丞，看到了中国的吴门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僧人清浚的《混一疆理图》，前一种地图对中国之外记载得颇详备，后一种地图不光注明了当时的地名，还标志出了“历代国都”，但是，他们还是觉得“好则好矣，了则未了”。为什么？因为这两种地图都对朝鲜缺略太多，日本又画得不详细，于是，他们命令一个官员李荃“更加详校，合为一图。其辽水以东，及本国（朝鲜）之图，泽民之图亦多缺略，今特增广本国地图，而附以日本，勒成新图”，这个“新图”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幅《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难怪除了地图中央是庞大的中国之外，右面就是被画得过分庞大的朝鲜，在朝鲜中央的圆形城郭符号上，大书了“朝鲜”二字，把朝鲜想象得这么大，正是因为重新绘制者来自朝鲜的缘故。

自我中心主义是哪个民族都免不了的，把自个儿放在中心去想象周边，并不只是中国人的习惯，自我夸张和自我放大也常常是凸显自信和自豪的策略，甚至无意识中也会如此。这我们不必管他，要紧的是一个知识史上的问题，要考察这一地图的基本知识源自何处。画《声教广

<sup>①</sup> 这份跋文亦见于权近《阳村先生集》卷二二，文字大体无差异，但是题作《历代帝王混一疆理图志》，见《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影印本）第七册。

度，据说，在1508年版托勒密《地理学》之前，欧洲人还没有完整的非洲地图<sup>①</sup>。那么，在郑和之前当然也是在迪亚士、哥伦布之前，是什么人有这样的地理知识，知道从未有过记录的好望角，从而让中国人绘出了非洲大陆的倒锥形状？是谁一一标志出了东起日本，经朝鲜、中国和中亚到阿拉伯半岛的各个地名，这是蒙古时代大一统的世界图像吗？它真的被威尼斯商人带到欧洲，并对欧洲人的大航海发生过影响吗<sup>②</sup>？最近，我读到一部全面研究这幅地图的书<sup>③</sup>，仿佛学术史百年前后必有遗响和回声一样，研究者和百年前的小川琢治都来自日本京都大学，这个叫宫纪子的年轻女学者的著作，对这幅地图作了迄今为止最细致的研究。不过，疑问仍然还在，这部题为《蒙古帝国所出之世界图》的新书，精致的腰封上面还是写着一句话：“世界最古的非洲—欧亚地图，为什么遗留在日本？”

真是谜一样的古地图。

<sup>①</sup> 参看前引 Phillip Allen 著，薛诗绮、张介眉译《古地图集精选——透视地图艺术与世界观的发展》。

<sup>②</sup> 此地图描绘的“世界”，东起朝鲜和日本列岛，东南绘出了麻逸（今菲律宾的吕宋岛）、三屿（今菲律宾的巴拉旺岛）等岛屿，西南绘有渤泥（婆罗乃）、三佛（今苏门答腊岛）、马八儿（今印度的马拉巴尔），正西绘出了倒锥形的非洲大陆及阿拉伯半岛，北面已绘到大泽（今贝加尔湖），几乎包括了欧亚非三大洲。

<sup>③</sup> 宫纪子《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图》（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2007）；在此前，也有高桥正对于这幅地图的研究，见《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再考》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续考》等，发表于《龙谷史坛》（京都：龙谷大学，1966）第56、57合刊号及《龙谷大学论集》（京都：龙谷大学，1973）第400、401合刊号。



被图》的“吴门李泽民”是谁？宫纪子的书里没有详细考证，但是她说，从嘉靖三十四年（1555）罗洪先所编《广舆图》中可以知道，《广舆图》曾经参考过蒙古时代的两幅图，一幅是朱思本的《舆地图》，另一幅就是李泽民的《舆地图》，从地图中的浙江沿岸还有“庆元”二字等等迹象可以看出，它是在蒙元时代绘制的，因为元末朱元璋称吴王时，便已经把蒙元时代的庆元改为“明州府”，而到了洪武十四年（1381），这个地方又改称“宁波府”了<sup>①</sup>。另一个画《混一疆理图》的僧人清浚却比较好办，他生于元泰定五年（1328），死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在宋濂《天渊禅师浚公还四明序》、南石文秀《增集续传灯录》（永乐十五年成书，1417）等等文献中，可以知道他是台州黄岩人，俗姓李，别号随庵，三十岁前后，曾经在宁波的阿育王寺佛照祖庵待过五年，画了《广舆疆理图》，那时还是元朝末年。一个叫做叶盛（1420—1474）的人，在他的《水东日记》里面记载了《广舆疆理图》的一幅摹本<sup>②</sup>，摹本作者严节的跋文里说，这就是清浚在元至正庚子年（1360）画的。他的地图，一是用的蒙元时代的地名，二是有“中界方格”就是经纬线，大概一格是百里，南北九十格，东西略少一些，“广袤万余”，三是对家乡就是他生活的庆元（宁波）、台州一带，标志得格外详细。

因为这个缘故，后来照着李泽民和清浚两幅地图再绘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也照样沿用了蒙元时代的地名旧称，宫纪子在

<sup>①</sup> 《元史》卷六二《地理五》“庆元路，唐为鄞州，又为明州，又为余姚郡。宋升庆元府，元至正十三年改置宣慰司，十四年改为庆元路总管府”（第1496页）。

<sup>②</sup> 叶盛《水东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卷一七。

书中举出不少例子，比如南京附近的“集庆路”，洞庭湖附近的“中兴路”、“天临路”，北京附近的“奉圣州”、“宣德府”等等，她判断大约这些地名都是1329年到1338年使用的一些地名，也就是说，这幅《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依据的原本《声教广被图》和《混一疆理图》，呈现的是蒙元时代的制度和知识。当然，古地图不像今天的新地图那样，注意地名的时间一致性，在知识史上常常会有以当下为中心，把古今中外汇聚在一起，不管三七二十一同时呈现的趋向。由于采用了天台僧人清浚详记历代国都的地图，这幅图中，时而孱有古代历史的地理知识，像这幅地图中的“尧都”、“舜都”、“商都”、“秦都”等已经消失的历史地名，时而也孱有民族潜藏的历史记忆，像这幅地图里面会特意标志出“大金都”、“女真南京”，宫纪子说，这是作为肃慎后人的地图制作者对于同出一源的女真族表示特别的敬意<sup>①</sup>，因为用了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就不免夸张地把周边广袤的空间统统画上，不管它是否真的属于“大元一统”。当然，也因为重新绘制的时候已经入了明代，就会把现实中已经知道的新地名写进去，于是，就有了明朝建文时代的“皇都”（南京）和“燕都”（北京）。不过，尽管有“皇都”和“燕都”，学界还是趋向于认定，这幅地图反映的是蒙元时代的知识。

确实是蒙元人的知识。这幅《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在朝鲜被绘制出来的1402年，朱元璋才死不久，持续了三年的“靖难之役”刚

<sup>①</sup> 据《金史》卷一《世纪》说，“金（女真）之先，出自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其中靺鞨曾经“附于高丽”，曾经帮助高丽与唐王朝打仗（第1页）。

刚落下帷幕。没有笼罩天下的力量时，中国人顾不上遥远的非洲，也没有派人下西洋，这些知识当然都是照抄蒙元人的。据说李泽民《声教广被图》非常详备地记载了“内自中国，外薄四海，不知其几千万里”的地理，那是“广域远迈汉唐”的蒙元人的阔大气象。问题是，正如宫纪子所追问的，既然它是元代人的知识，那么，在欧洲人之前，亚洲人怎么会先知道有关非洲的地形？为什么蒙元时代能够画出这样的亚非欧洲地图？这件事情真是说不明白。尽管在欧洲早期的T-O形地图中，也有过把亚洲、非洲、欧洲画成三叶形的世界，不过，那毕竟只是想象。尽管也有人提出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来证明中国人早就对非洲有了解，但是，就算有了关于非洲的见闻录和旅行记，也不等于可以绘出一大洲的地形图。

可是，在《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不仅阿拉伯半岛画得相对准确，也画出了大体的非洲。那个过分夸大的湖泊，是不是今天说的“大湖”？右边那条末端有两个分叉、贯穿南北流入红海的河，应该是尼罗河(NILE RIVER)吧？左边从大西洋东西横贯的河流，是尼日尔河(NIGER RIVER)，还是刚果河(CONGO RIVER)呢？这真是太奇怪了，难怪有人会觉得这下子可打破了欧洲人发现世界也发现非洲的迷思(Myth)<sup>①</sup>。

① 不仅仅是对知识全球化历史的认识，这种新发现也许还会引出意想不到的革命性结果。2002年，在南非国民议会的“千年项目地图展”上，据说，曾经展出过这幅藏于日本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和来自中国的《大明混一图》的摹本，女议长费琳·金瓦拉看了这幅地图后，说了一句相当有“后殖民哲理”的话，她说，“这个展览的目的是，让我们不要被别人(殖民者)强加给我们去信服的东西所束缚”。每一次新知识的发现当然都是对旧常识的瓦解，女议长说得不错，它能把他人强加给我们去信服的东西，从我们的习惯性思维中去除“常识”或者“熟悉”，从而解开观念的束缚，这本是历史学不断发现新材料的意义所在，可是也恰好给了后殖民理论提供了一个例证。

### 三 是回回人的礼物吗？

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说明这些地理知识的来源，这使它成为知识史上的难解之谜。不过，很多学者都倾向于相信，这和色目人中的回回人有关。

《元史·地理志》里面说汉隋唐宋“幅员之广，咸不及元”，确实是真的，“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sup>①</sup>。看过陈垣先生《元也里可温教考》和《元西域人华化考》这两部名著的人都知道<sup>②</sup>，在蒙古人席卷欧亚之后，国界似乎渐渐淡化，广袤空间中人来人往，欧洲人到中国的，绝不只有马可·波罗，而中亚西亚的所谓西域人到中国的更多，他们一方面学到了中国的文化，陈垣曾列举当时儒学、佛老、文学、美术、礼俗和女学诸领域的“外国专家”，一方面又带来了阿拉伯的文化，那些长着满脸络腮胡子，双眼碧蓝，鼻子高耸的“色目人”，不仅仅会变戏法，还有很多汉族中国人不会的“奇技淫巧”，像会造火炮的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像会造塔塑像的阿尼哥等等<sup>③</sup>。通过丝绸之路东来的外国人，比起汉唐来不知多了多少倍，而延祐元年弛海禁之后，乘船到达泉州、广州、宁波三个市舶

① 《元史》卷五八《地理一》，第1345页。

②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51~187页。参看杨志玖《元代西域人的华化与儒学》，原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第四辑，后收入其《陋室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02)。

③ 《元史》卷二〇三《方技》，第4544~4545页。

我们也许对那个时代的「全球化」估计太低，其实，很多异域知识的传播和影响，在中国已经相当深刻和广泛，正如柳诒徵说的，蒙元时代的文化「兼盖中国、印度、大食及欧洲四种性质」。

司来做生意的阿拉伯商人，也已经不再是少数侥幸海上逃生的探险者，在各种进口时髦商品之外，他们可能带来了很多新知识。

我们也许对那个时代的“全球化”估计太低，其实，很多异域知识的传播和影响，在中国已经相当深刻和广泛，正如柳诒徵说的，蒙元时代的文化“兼盖中国、印度、大食及欧洲四种性质”<sup>①</sup>。有一个例子，我始终觉得应当一提再提，这就是《元史》里面提到的那个西域人札马鲁丁（又写作札马刺丁，Jamal al-Din），他不仅在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进献了万年历<sup>②</sup>，而且还给皇帝制造了各种各样的“西域仪象”<sup>③</sup>。其中一个仪器叫做“苦来亦阿儿子”的，竟然是一个地球仪（有人说，“苦来亦阿儿子”就是阿拉伯语KURAHAIZ的波斯读法KURAIARZ，“苦来”意为“球，苍穹”，“亦”是标志属格，“阿儿子”意为“陆地，土地或国家”）<sup>④</sup>：

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穿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

这里说的“圆球”，不懂得地球为圆形的人会知道吗？所谓“七水

①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重印本，1996）下册，第二十一章，第544页。

② 《元史》卷五二《历一》，第1120页。

③ 《元史》卷四八《天文》，第99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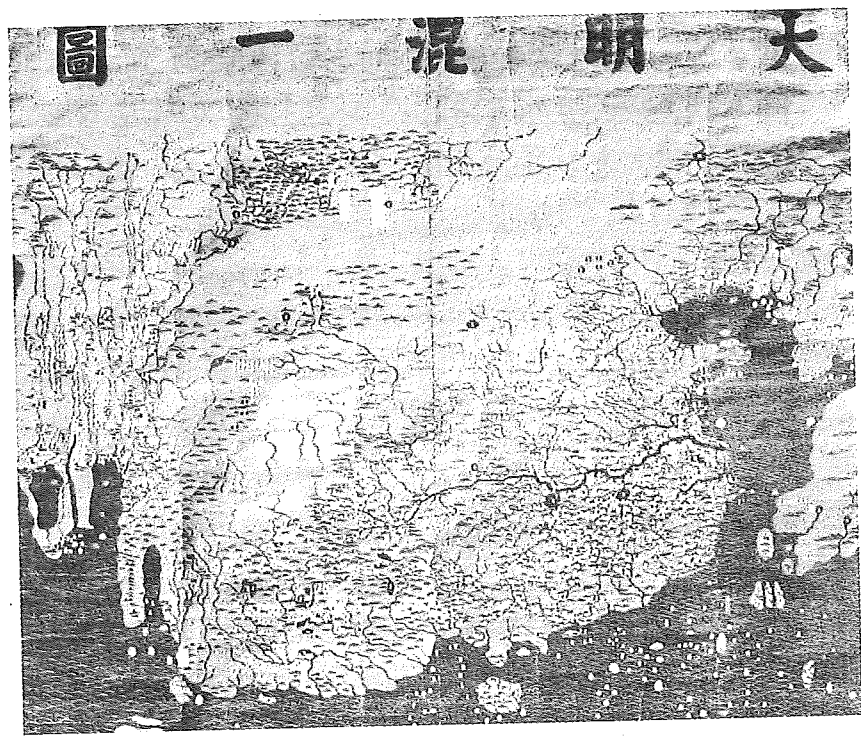
④ 织田武雄《地图的历史——世界篇》（东京：讲谈社，1994）中指出，在欧洲中世纪普遍否定地球体说的时代，是伊斯兰地理学继承了古希腊的地球球体说，制造着地球仪（第83页）。

三地”，如果不对整个地球的大海和陆地有充分了解，能够说出来吗？用“小方井”给地球画了格子，就应当是经纬线吧？如果能够计算“道里之远近”，那么，对于遥远的异域，会有什么样的知识呢？特别是，就是这个札马鲁丁，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主持了《大元一统志》的编纂，那个时候，为了“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朝廷曾经让大臣招聘一批“鸿生硕士，立局置属总其事”，当时还“大集万方图志”，所以，他给皇帝的建议中说，现在，汉族地区的地图已经有四五十册了，可是现在皇元的地盘太大了，“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们）的，有的图子有也者，那远的他每（们）怎生般理会的？回回图子我根底有，都总做一个图子呵”<sup>①</sup>。可见，他的任务就是要绘制一个包括蒙古时代一统世界的总图，而他本来就有回回的地图，现在又有了汉族人的地图，还在收集各种“远的”地图，从现存资料看，他还曾经要求朝廷征召“蛮子汉儿秀才”如陈俨、虞应龙、萧维斗等等，一起编类地理图书。那么，《声教广被图》和《混一疆理图》的异域知识，是否就来自这里呢<sup>②</sup>？

不必等到意大利人利玛窦来，这些随着蒙古人进入汉族中国的西域人，便已经把关于世界的知识传进来了，只是汉族中国人，可能还不懂它的意义罢了。但是，就算中国人不懂，难道不可以照猫画虎么？

① 王士点、商企翁编《秘书监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卷四，第72页，第74页。此书点校本，承黄时鉴教授提示并寄赠，特此致谢。

② 参看马建春《元代东传回回地理学考述》，载《回族研究》（北京）2002年第1期，第14~18页。



《大明混一图》

#### 四 超越疆域的知识史视野

好多年来，人们都以为龙谷大学所藏的这幅《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独一无二的，“孤证不立”的原则让人们对这种异常知识史现象将信将疑。然而，1988年，日本旧岛原藩松平氏的菩提寺即长崎的本光寺，又发现了一幅同样有权近跋文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回的地图长220厘米，宽280厘米，比龙谷本还要大，是用很厚的纸绘制的。据宫纪子研究，它和龙谷本出自同源，却略有不同，可能比龙谷本要晚一些，因为它已经根据16世纪的资料，补充了一些朝鲜和日本的地名。这已经太叫人吃惊了，然而发现还在继续，这些年里，日本学者又陆续在熊本的本妙寺、天理的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发现了同样左有非洲、阿拉伯半岛，右有巨大的朝鲜和日本的《大明国地图》<sup>①</sup>。而中国也在最近几年，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大明混一图》，这幅更大的地图上也画了非洲和阿拉伯半岛，只是这个地图左边的非洲和右边的朝鲜，都比上面几幅地图小了一些，而日本列岛却变得大了许多<sup>②</sup>。

为什么这幅朝鲜人画的地图会收藏在日本，是倭国侵入朝鲜后掠走，由丰臣秀吉赐与西本愿寺的，还是通过通信使的往来，由朝鲜官员携到日本的？或者是近代西本愿寺的大谷光瑞从朝鲜半岛买

<sup>①</sup> 均参看宫纪子《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图》（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2007）。

<sup>②</sup> 关于《大明混一图》，可以参看前引《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的图版1，以及同书后附汪前进、胡启松、刘若芳《绢本彩绘大明混一图研究》，第51<sup>1</sup>-55页。

---

回来的？我们不得而知，只是觉得有趣的是，这幅地图的知识真是太“全球化”了，先是融入了可能来自阿拉伯的世界地理知识，他们给人们介绍了只有他们才熟悉的阿拉伯半岛和非洲大陆，接着变成了汉族中国人绘制的地图，把中国想象在世界中央，并变得无边浩大，然后在朝鲜人手中重新绘制并改造，朝鲜也在地图中被放大了好几倍，再接着却又流传到了日本，悄悄地藏在深深的神宫佛寺之中，直到20世纪才重见天日，引发了学界的惊讶和震撼。知识的传播和辐射，常常超越国境，尤其是在国境线不像现代国家那样需要护照和签证的古代，因此知识的发明，难以像专利局颁发证书一样，把它归于哪一国哪一家。据说，韩国人对这幅不存其本国的地图相当自豪，2004年他们宣布发行《韩国古地图》邮票四枚，其中之一就是这幅《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先人对于世界的新知识的证据。可是，中国学界并不认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朝鲜对于世界的知识发明，只承认这是朝鲜为世界保存了一个全球知识史的重要材料，并暗地里希望这是中国人的地理发明。可我并不认为这是汉族中国固有的知识，毕竟在那个时代，中国人仍然相信华夏之外没有那么广袤的四裔，孟席斯的话虽然中听，却未必可靠。

不是中国人发现好望角，希望不会挫伤中国的自尊，我们有理由自豪，毕竟中国古地图记载了那个遥远的非洲。尽管它保存在日本，但是知识却并非日本的，只是要感谢日本人的收藏嗜好和习惯，也要感谢他们重新发现这幅地图，这让人类的知识史得以重新书写。在

---

这一个古地图中，我们看到知识史的相互微妙关联，真好像是“冰岛的一阵风，吹皱了地中海的波浪，地中海的微微波浪掀动着爪哇的暖流，而暖流却鼓起到琉球的风帆”。

## 第二编 交错的亚洲、东亚与中国

- 第四章 西方与东方，或者是东方与东方——清代中叶朝鲜与日本对中国的观感
- 第五章 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
- 第六章 国家与历史之间——从日本关于中国道教、日本神道教与天皇制度关系的争论说起



明刻《福建沿海图》以海为上岸为下